

Research Articl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from “Pu’er Image” to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

Zhou Jianhong¹, He Haoyang^{2,*}, Luo Binyang³

¹Belt and Road Research Institute, Pu'er University, Pu'er, China

²Divis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u'er University, Pu'er, China

³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er Municipal Committee, Pu'er,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nalization of the grand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not derived solely from classroom instruction or official publicity; rather, they emerge gradually through everyday encounters with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ir host city.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linkage between “place experience” and “macro-narratives.” Taking Pu’er City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as empirical referenc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place attachment theory to construct a three-tier explanatory framework that moves from “place image perception” to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framework proposes that such consciousness is not a direct import of abstract ideals; instead, it is formed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of place attachment—cognitive imag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functional dependence—which enable students to embody and recognize the geo-symbiotic, empathetic, and functionally interdependent dimensions of the shared-future vision.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macro-ideals are realized at the micro-level, and provides scholarly support for border cities to foster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roug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Keywords

Pu’er Image, Place Attachment,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lanatory Framework

*Correspondence: He Haoyang (jghhy1007@163.com)

Received: 9 June 2026; **Accepted:** 14 July 2026; **Published:** 2 September 2026



Copyright: © The Author(s), 2026. Published by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地方依恋视域下从“普洱形象”到“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

周建红¹，何昊旻^{2*}，罗彬洋³

¹ 普洱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普洱，中国

² 普洱学院科学技术处，普洱，中国

³ 中共普洱市委党校，普洱，中国

摘要

来华留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理念的理解和内化，并非仅来自课堂教育和官方宣传，更是在其日常生活的具体场域中，通过对所在城市的文化、社会与生态体验而逐步生成。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地方体验”与“宏大叙事”之间的理论连接机制。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及其南亚东南亚留学生群体为经验参照，引入地方依恋理论，构建一个从“地方形象认知”到“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三阶解释框架。该框架主张：留学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理念的直接输入，而是通过认知形象、情感体验与功能依赖等地方依恋的多重路径，对“命运共同体”中的地缘共生性、情感共情性与功能互依性进行具身体认而逐步生成的。研究为理解宏观理念的微观落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边境城市通过留学生教育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

关键词

普洱形象，地方依恋，命运共同体，留学生，解释框架

1. 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然而，这一宏大理念如何在微观层面上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青年所理解、认同和内化，始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理论问题。目前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内涵阐释与国际传播路径分析，而较少关注具体群体对这一理念的亲身感知与生成过程。与此同时，来华留学生研究虽然广泛探讨了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与城市形象的认知，但鲜有研究将这些地方性体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察。

本文尝试回答一个核心理论问题：留学生对所在留学城市的地方性体验，如何影响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理念的理解与认同？换言之，微观的“地方形象认知”与宏观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是否存在一条可辨识的理论连接路径？如果存在，这条路径的机制是什么？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及其南亚东南亚留学生群体为经验参照，引入地方依恋理论，尝试构建一个从“地方形象认知”到“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解释框架。选择普洱作为分析范例并非偶然：普洱地处“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特殊地缘位置，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接壤，拥有486公里国境线和多个国家级口岸，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沿窗口。普洱学院已累计培养澜湄国家留学生逾1800名，其中老挝学生占留学生数比高达87%。这一以澜湄国家为主体的留学生群体，其日常生活所依托的城市空间本身就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微观场域——他们从地缘上毗邻故国，从文化上与中国西南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自身的存在状态即是“命运相连”的鲜活证明。因此，普洱为研究地方体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连接机制提供了一个独具学术价值的田野样本。

2. 理论基础在于地方依恋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交汇

2.1. 地方依恋理论的核心维度与留学生迁移语境中的拓展

地方依恋 (place attachment) 是环境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意指人与特定场所之间形成的情感性联结。Williams和Vaske将地方依恋分解为两个核心维度: 场所依赖 (place dependence) ——对场所提供的功能需求的满足程度[1]; 场所认同 (place identity) ——个人将场所纳入自我身份构成的情感归属。Lewicka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地方依恋的内涵, 区分出场所依赖、场所发现、场所认同与场所传承等多重面向[2]。Manzo则强调不应将地方依恋视为同质和静态的概念, 因为人们对有意义的场所的态度来自一系列积极与消极的情感与经验, 地方依恋本身是动态和多维的[3]。

地方依恋理论最初主要应用于常住居民和地方原住民研究。但近年来, 学者们开始将其拓展至移民与流动人口领域, 尤其是国际学生群体。有研究认为, 国际学生的跨国流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中断” (place disruption) 的过程——它代表着远离熟悉场所的纽带, 同时与新的东道场所建立联系[4]。这一定位为理解留学生在留学城市中的地方依恋生成提供了关键视角: 留学生并非在一个“空白”的地方建立依恋, 而是在经历了对故土地方依恋的中断之后, 在东道地重新建构意义联结。对波兰移民的研究表明, 移民的地方依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同维度的地方依恋 (如功能依赖、地方认同) 可以共存, 并随着适应过程逐步浮现[5]。Gallucci对帕多瓦大学国际学生的研究发现, 地方依恋与居留意愿之间存在复杂关系: 虽然地方依恋可以促进居留意向, 但社会支持、身份协商和结构性障碍同样扮演重要角色[6]。此外, 有研究显示, 时间因素和居住地点显著影响学生的地方依恋水平——年龄较大、对毕业后生活有更清晰规划的国际学生更容易将留学城市视为自己的“家”[7]。

在中国语境中, 关于留学生地方依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艳国等对英国伯明翰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表明, 文化适应程度直接影响留学生的日常空间行为, 进而影响其对东道环境的认同感[8]。这一发现提示: 文化适应与地方依恋之间存在双向强化关系, 二者共同塑造留学生对东道地方的认知与归属感。

2.2. “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生机制与“六共”逻辑的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 在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邱耕田教授提出的“六共”逻辑, 系统呈现了命运共同体“出场”的完整闭环:

共生逻辑、共识逻辑、共行逻辑、共利逻辑、共情逻辑、共序逻辑[9]。这一框架对理解“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在“六共”逻辑中, 共生逻辑从地理空间角度揭示了“人类是一个整体, 地球是一个家园”的客观前提。这意味着命运的“共同性”首先不是价值判断, 而是生存事实。共情逻辑指向情感聚合——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基于相互理解 and 情感共鸣而产生的认同感。共利逻辑则强调共同利益的驱动作用。三者共同构成了从“客观共生事实”到“主观认同生成”的基本通道: 人们首先意识到彼此共存于同一空间场域 (共生), 在此基础上产生情感共鸣 (共情), 并由于共同利益的感知而形成合作意愿 (共利), 最终才有可能走向价值的共识与行动的共行。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认同的研究仍以宏观理论分析为主, 实证性—经验性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往往将认同过程诉诸国家层面的制度传播与战略沟通, 而相对忽视了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空间中通过亲身接触和情感互动对“共同体”理念的具身体认。这为本文引入地方依恋理论留下了空间。

3. 解释框架基于从地方依恋到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转化路径

3.1. 框架的逻辑起点: 地方形象作为“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身化场域

正如有学者指出, “来华留学生因在中国学习而与中国形成命运共同体, 其学业选择、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交往等与其中国形象的正向建构紧密关联”[10]。这一判断虽指出了留学生与中国的实际关联, 但尚未具体揭示这种关联如何转化为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本文认为, 关键在于将抽象的“命运”二字拉回到留学生日常生活的具体空间中——留学生感受到的“命运与共”, 往往首先表现为与所在城市的“呼吸与共”。

以普洱为例。当一名来自老挝的留学生行走在普洱的街道上, 他所置身的是一个多层次的空间: 从宏观看, “一市连三国”的地理格局使他无需跨国旅行便能感受到多民族、多文化的共在; 从中观看, 普洱作为“世界茶源”与“中国咖啡之都”, 其茶马古道文化、民族节庆与边境贸易传统, 本身就蕴含着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历史; 从微观看, 他每天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普洱学院校园中的国际生社群生活、甚至菜市场中与摊贩的讨价还价, 都是跨文化接触的具体发生。

这个多层次的“地方”, 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物理载体, 也是留学生对该理念进行意义建构的原料库。因此, 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的逻辑起点在于留学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非“灌输”的结果, 而是通过对地方空间的功能依赖、情感投入与文化认同而逐步生成的。

3.2. 三阶转化路径：认知形象—地方依恋—共同体意识

基于上述逻辑起点，本文构建“认知形象—地方依恋—共同体意识”三阶转化框架。

第一阶段：普洱形象认知。留学生进入普洱后，首先形成对该城市的基本认知，这一认知结构可分为三个维度：认知形象（cultural-cognitive image），即对普洱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等客观信息的获取和评价；情感形象（affective image），即对普洱整体的喜爱程度、安全感和亲切感；意动形象（conative image），即留学生在认知和情感基础上产生的行为意向，如是否愿意向亲友推荐普洱、是否愿意未来再次造访或留在当地。

第二阶段：地方依恋形成。在持续的日常接触中，部分留学生开始对普洱形成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其中，“场所依赖”表现为留学生对普洱提供的教育机会、生活便利性、就业前景等功能性需求的满足程度；“场所认同”表现为留学生将普洱视为“第二故乡”的身份情感，认同这一地方在自我生命故事中的意义；“场所传承”则是一种更高阶的依恋形式——留学生不仅认同普洱的意义，还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如推荐他人来普学习、参与中老跨境合作等）将这种地方价值延续下去。

第三阶段：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成。当地方依恋达到一定强度，留学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便在三个层面逐步展开：首先，地缘共生体认层面——留学生通过对“一市连三国”地缘格局的切身感受，形成对“多个国家的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中”这一共生事实的直接认知。这种共生性不像国家层面的命运共同体那样宏大抽象，而是通过边境市场的熙熙攘攘、跨境学子同处一校的日常共在、中老铁路开通后普洱与老挝的人流物流往来等具体场景被“身体感知”的。其次，情感共情认同层面——留学生在普洱建立的友谊、获得的文化包容体验、参与的中老跨境节日等活动，转化为对他国人民（尤其是中国民众）的亲近感与共情能力，这是“共情逻辑”在个体层面的实现。最后，功能互依认知层面——留学生在专业学习中的跨文化合作、对未来就业中跨境交流场景的预期、对中老铁路建成后普洱与老挝之间经贸往来的亲身观察，共同转化为对“区域共同利益”的功能性感知。

3.3. 框架的内在逻辑：功能、情感与意义的逐级升华

上述三阶框架体现了从“功能满足”到“情感归属”再到“意义认同”的逐级升华逻辑。

第一，功能性连接的优先性。对于刚抵达普洱的留学生而言，最先建立的是功能性依赖：校园设施是否完善、食宿是否便利、语言是否通畅。这些满足感的累积，构成了地方依恋的最初基础。第二，情感性投入的不可替代性。

当功能性需求得到满足后，留学生才会转向情感层面的投入——友谊的建立、文化的好奇与接纳、对城市氛围的欣赏。情感性投入决定了留学生是否真正将普洱视为“有意义的地方”而非仅仅是“学习的地方”。第三，意义性认同的生成条件。只有那些同时获得了功能满足与情感归属的留学生，才有可能进入最高阶的意义认同阶段——在普洱的日常生活中体认到“命运与共”的深层意义，并最终将这种个人经验升华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阶之间并非严格的线性递进关系。留学生可能在功能依赖尚未完全满足时已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也可能在情感归属较浅的情况下对功能依赖有高度评价。框架的核心主张在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必然以某种程度的地方依恋为前提——不管是功能性的、情感性的还是意义性的——因为没有地方经验的具身体认，“共同体”理念对于留学生而言将始终停留于抽象符号的层面。

4. 框架的理论对话与实践意涵

4.1. 与既有研究的理论对话

本文框架的核心理论对话对象是当前留学生研究中“宏观叙事”与“微观体验”的分离趋势。

一方面，关于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认知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现。叶淑兰[11]、姚君喜[12]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留学生的中国形象认知受到个人经历、媒介信息和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其认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镜像”过程。阿林娜借鉴目的地形象理论，将留学生对中国城市的认知分为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意动形象三个维度[13]。然而，这类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留学生如何认知中国/城市”的层面，较少追问“认知之后如何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价值认同”。换言之，既有研究揭示了“是什么”（留学生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但对“所以然”（这些感知体验如何影响其世界观和国家观）缺乏深入的理论阐释。

另一方面，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与认同的研究，以理论思辨为主，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国际青年群体的认知与态度。叶鸿宇探讨了课程设置、校园文化等因素对来华留学生理解该理念的影响，但研究单位仍以课堂教学和制度环境为主，而非留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14]。牟琛对理念国际认同建构的研究虽视野开阔，但重点仍在国家层面的传播策略[15]。

本文框架在二者之间架设了一座理论桥梁：将留学生对城市的认知形象、情感体验与功能依赖等地方依恋要素，作为解释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关键中介变量。这一视角的独特贡献在于，它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从纯粹的政治哲学领域，延展到了日常空间中的文化相遇与情感互动领域。换言之，“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外交辞令，它也可

以在普洱的一条街道、一杯咖啡、一次课堂讨论中被留学生亲身感知和确认。

4.2. 实践启示：以“地方故事”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本框架对边境城市的对外开放和留学生教育工作具有明确的实践启示。

以普洱为例，中老铁路的开通使普洱从“边疆末梢”跃升为“开放前沿”[16]。普洱学院累计培养澜湄国家留学生逾1800名的事实表明，教育交流已成为普洱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17]。然而，如何使留学生从“物理在场”转化为“情感在场”和“意义在场”，仍有大量工作可做。

本框架提示，以下策略可能有效提升留学生的地方依恋水平，进而促进其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第一，强化“功能依赖”——完善留学生生活保障体系，提供便捷的跨境交通服务（如中老铁路留学生优惠），优化课程设置以满足东南亚学生的就业需求。第二，培育“情感认同”——组织具有澜湄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如中老越三国边境商品交易会志愿活动、国际精品咖啡博览会志愿活动，校企文化交流活动），创造中外师生深度交流的机会，以具体的“人—人”关系承载抽象的理念传播。第三，构建“意义传承”——鼓励归国留学生成为“地方故事”的传播者，通过他们的亲身讲述传递在普学习生活体验，使普洱的“地方故事”成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象化、情感化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留学生地方依恋的形成也受到文化适应程度的调节。研究显示，文化适应程度越高的留学生越倾向于探索城市核心空间，文化坚守程度越高的留学生则更依恋同质文化空间[17]。这说明，普洱的教育和文化工作者需要关注不同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策略差异，避免简单化的“同化”取向，而应以更加包容和渐进的方式引导留学生逐步建立多层面的地方连接。

5. 结论与局限

本文从地方依恋理论出发，尝试构建了一个从“地方形象认知”到“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三阶解释框架。框架的核心命题是：留学生对宏大理念的理解和内化，并非仅来自课堂教育和官方宣传，更是在其日常生活的具体场域中，通过功能依赖的满足、情感投入的深化和意义认同的升华而逐步生成的。这一框架为弥合当前来华留学生研究中“微观体验”与“宏观叙事”之间的理论隔阂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为理解边境城市通过留学生教育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

然而，本文的框架构建仍处于理论演绎层面，面临着若干局限。第一，经验验证的缺乏。框架的有效性有待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未来研究中，可针对在普留学

生开展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检验地方依恋各维度对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预测效力，并在控制人口学变量、文化适应程度、媒体信息接触等干扰变量的基础上，探究从地方依恋到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转化条件。第二，因果机制的复杂性。框架预设了从地方体验到共同体意识的单向影响方向，但实际过程中二者可能相互强化：已经具有较强共同体意识的留学生可能更主动地投入地方生活，从而进一步强化地方依恋。这种双向互动关系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明。第三，文化边界效应的未考量。不同来源国的留学生因其与本地的地缘与文化距离差异，对普洱的地方依恋形成速度和强度可能有所不同。老挝学生与普洱的文化距离相对较近，而缅甸、越南学生则可能存在不同的适应轨迹，这些差异需要在框架的精细化调整中予以充分考虑。第四，边民身份的特殊性问题。部分留学生的家族可能本身就跨越国境分布于中老边界两侧，他们的身份边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与“中国”二元划分。对这一群体的“双重地方依恋”及其对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特殊影响，框架目前尚未充分回应。

尽管如此，本文框架的提出本身即是推进“从地方到共同体”理论思考的第一步尝试。在后续研究中，我们期望通过扎实的质性探索与量化验证，不断检验、修正和丰富这一框架，使其真正成为理解留学生群体认同生成机制的可靠分析工具。

基金项目

2026年度普洱市党校(行政院校)系统课题“南亚东南亚国家来普留学生对普洱形象认知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成研究”(2026PEDXKT08)；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教师类项目“云南国门大学中两亚留学生消费行为对当地的影响研究”(2025J1061)。

参考文献

- [1] WILLIAMS D R, VASKE J J.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J]. *Forest Science*, 2003, 49(6): 830-840.
<https://doi.org/10.1093/forestscience/49.6.830>
- [2]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3): 207-230.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0.10.001>
- [3] Manzo, L. C. For Better or Worse: Explori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lace Meaning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5, 25(1): 67-86.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5.01.002>
- [4] QUINTERO K, ZERVA K. From place disruption to attachment: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23, 21(4): 387-405.
<https://doi.org/10.1080/14766825.2022.2144334>

- [5] TRĄBKA A. From functional bonds to place identity: Place attachment of Polish migrants living in London and Oslo.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9, 62: 60-73.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9.02.010>
- [6] Gallucci, D. What Makes People Stay: Explor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 Home, and Identity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Padova [D]. Padova: University of Padua, 2024.
- [7] BIRSENS J. Analysing urban integration through place attachment: How do university student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ted urban space? [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4, 30(7): e2783. <https://doi.org/10.1002/psp.2783>
- [8] 从艳国, HUNT D, 魏立华, 等. 文化适应背景下留学生的日常行为空间特征——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留学生为例 [J]. *人文地理*, 2022, 37(3): 81-87.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3.010>
- [9] 邱耕田. 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的“六共”逻辑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6(01): 5-13+205.
- [10] 刘衍军.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的来华留学生中国形象认知及教育传播探析 [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1(22): 69-71.
- [11] 叶淑兰. 镜像中国: 上海外国留学生的中国形象认知 [J]. *社会科学*, 2013(9): 14-26.
- [12] 姚君喜. 外籍留学生对中国人形象认知的实证研究 [J]. *当代传播*, 2015(4): 64-66.
- [13] 阿林娜. 在华留学生南京市旅游地形象感知特征及其影响作用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5. <https://doi.org/10.27245/d.cnki.gnjsu.2022.002396>
- [14] 叶鸿宇. 新时代“一带一路”留学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研究 [J]. *公关世界*, 2022(8): 6-7.
- [15] 牟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认同建构研究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25.
- [16] 王琳. 从“边疆末梢”到“开放前沿”: 普洱加快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前沿窗口 [EB/OL]. (2025-11-28) [2026-07-13]. <https://puer.yunnan.cn/system/2025/11/28/033748016.shtml>
- [17] 推进普洱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新局面 [EB/OL]. (2026-01-23) [2026-07-13]. <https://www.puerw.cn/content/202601/23/c470381.html>